

论王充思想文化精神的内涵

——纪念王充诞辰1990年

徐 斌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王充治学以儒家为根基,但他善于打通各家学说,并吸纳新的知识成果,创立新说,通过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求索创新的治学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成果等四个层面,成就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传播,不单局限于学术学人领域,还以学术精神为内核外延至百姓生活之中,对塑造大众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持久的影响与引导。这是王充有别于许多主流学术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键词:王充;学术根基;理论创新;思想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B23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8)03-0078-06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8.03.007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Wang Chong ——for the 1990th Anniversary of Wang Chong's Birth

XU 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ang Chong's academic research was based on Confucianism. However, he was good at breaking through the doctrines of different schools and absorbing new knowledge and creating new theories. His independent spirit of free thought, his mode of "factual judgment", his style of searching for innovative scholarship, and his ideological proposal of "emphasizing facts and denying exaggeration" work together to form a valuabl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pirit. The spread of this spirit is not limited to academic scholars. It also extends beyond the academic circle to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nd has a lasting guidance on the public cognition, values, codes of conduct, and customs. Thi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Wang Cho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many mainstream academic thinkers of the time.

Key words: Wang Chong; academic found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pirit

王充作为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名硕通儒,却在儒学史上长期存在“身份”认同问题,多数观点认为,王充虽然博涉多通,治学之路颇显奇异,但从他的学术传承、治学志向和思考方式看,仍不

收稿日期:2017-12-01

作者简介:徐斌,男,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浙江省儒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脱儒家基本框架,可视为儒学发展中别具一格的一支。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充的学说,偏离汉学主旨,俗而芜杂,且有问孔刺孟之言,已脱离儒家主流,当归为另类、杂家。

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皆有其道理和依据,而王充恰恰是把上述两种表现统一在自己身上的,广泛、丰富、多样的思想内容在《论衡》^①中是共融的、互补的,形成学说的复合结构。这点确与讲究传承的主流儒学有所不同,正是认识王充地位与价值的重要基点。与历史上的大多数学问家不同,王充的学说当之无愧地成为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并且这种精神的影响与传承,不单局限于学术学人领域,还直接或间接地播扬于民间的思想文化之中。这让王充超越儒学成为世界思想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和伟大的思想家。

一、儒者所怀,独已重矣

王充的治学以儒家为根基,终生矢志于继承、弘扬孔子之道,他深入探寻汉儒学说的宇宙生成和天人关系问题,思考并发展儒家的德治主义,孝道思想,成就斐然。但王充同时感到,面对社会上和思想界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复杂情况,仅仅遵守儒学难以给出完满回答,甚至于有的地方“世儒”的陋见陈说本身就有问题,误导舆论,构成世人认识真理的障碍。有必要开拓视野,汲取道、法、刑名、墨、兵、农等多家思想资源,在广博深厚的知识和学理基础上,作出更为合理、准确的解答,他在《论衡·效力》篇中表达了这种情怀:“儒者所怀,独已重矣,志所欲至,独已远矣”。由此,王充的思想又出现了超越儒家或曰逸出儒家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汉儒阅读世界的视角比较机械、单一,即循先圣目光,经典思路,拘泥于书本知识。王充认为,读书如果仅限于一经或数经,那是可怜又可悲的,就跟聋子、瞎子差不多,“其为闭暗甚矣!此则土木之人,耳目俱足,无闻见也。”(《论衡·别通》)要深入思考学术,全面认识世界,必须把眼界放大到一切已知和未知的范围之中,“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除了已有的诸子百家外,还须研习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昆虫学、药理学等自然学科各个领域。

对于前人留下来的百家之言,王充努力汲取,兼收并蓄,达到“怀百家之言”“博通众流百家”的程度。他认为,百家之说可谓经典的背景与重要补充,还可以当作参照,以纠正经书中的纰漏,“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所谓“百家之言,令人晓明。非徒窗牖之开,日光之照也。”(《论衡·别通》)

认识世界的视角,王充与汉儒的最大区别处还在于对现场观察与考证,这一特别的注重,充分体现为经验实证的治学方法,“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从中获取知识与书本记载互证互补。在如何看待和取舍知识的问题上,他提炼出“贵用”的着眼点,无论王充前的经学还是之后的儒家,讲“致用”,多为经邦治国,化民驭民之术。王充则着重于明道安邦,益世佑民,所以“贵用”的范围,眼界较汉儒要广阔、实在许多,拓宽至化自然为人利的所有方面:“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论衡·超奇》)

其二,“事莫名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汉儒也讲自己的治学境界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他们大多认为,此事自董仲舒重释孔子后已有答案,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也就是说,他们认识论上信奉的是价值判断。王充剖析了官学的这种局限与弊病,同时亦打造、构建着以“事实判断”为基石的方法论。相对于价值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则是倒过来认知的,无论圣贤之说还是世间经验,在接受之前,须先经过怀疑和验证程序。这一基本的思维差别,成就了王充与众不同的治学观:独到的问题意识、阅读视角和认知框架。

任何学问、论点,皆有重新认识的必要,统属以“求实诚”思路“效验”的对象。这便是治学时必先树立的怀疑精神。王充不赞成简单化的尊贤称圣,所谓经典的作者并非先知先觉,其知识也与常人一样,是后天学习得来的,那种“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

^①本文所引注释王充《论衡》处均以各篇名简称,参见:《诸子集成》卷七,中华书局1954年版。

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论衡·实知》)的说法,皆属虚言。如此说来,圣贤之言就不能视为真理和知识的惟一源头,而应看作所要认知的“天下之事,世间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考论虚实”。而考论之下,果然发现不少问题,无论对宇宙天象的解释,还是社会历史的论述,乃至一些事件、现象的记载,多“虚妄言也”。王充又用这种思路去考察俗论,益觉“浮华虚伪之语”流行,“非其实也”。此种治学思路的形成,标志着别树一帜的新境界:求知问道不受经典的框限与束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经典既是价值和知识的来源又是“道实验”的对象。

王充总结的治学观,今天看来清晰易懂,算不上深奥。然而,正是这个为今人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情况,说明了王充认识水平在当时的先进程度。当汉儒们还在神学加经学中打转之际,王充构架了一个感性知识与理性思维交叉互动,书本记录与观察经验相互映证,最终将一切真知考之于“效验”的治学思路,为“事实判断”思维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样做的意义,不光是推出本《论衡》的问题,更着眼于为后来学者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注入一种思想发展中弥足珍贵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证之以实的思想方法:“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也就是重视“存在”的价值,倡导和树立“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对作》最后,他用警句式的语言宣明宗旨:“《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其中“实事疾妄”乃统领全局的灵魂。吴光先生指出,“对王充学说的根本特点,过去往往只强调它‘疾虚妄’的一面,忽略其‘定真是’的另一面。”《对作》中“实事疾妄”一语“点明了全书的宗旨大纲,也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学说的根本特点,其‘实事疾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实事’是立的方面,‘疾妄’是破的方面。”^[1]据此,有学者将王充的学说称为“实学”。

其三,“冀俗人观书而自觉”。王充生活的东汉时代,民众的文化世界笼罩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世间的“俗见”之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普遍缺乏对“世间万物”真实而正确的认识,迷信、盲从大行其道,受到愚弄而不自知,精神世界处于封闭、收敛状态,深陷在“天人感应”的神学迷雾中不能自拔。王充对此痛心疾首,认为此乃思想文化中迷信神学、圣言的价值导向使然,没有批判,不敢怀疑,信守成说,久而久之,便失去了独立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的能力,生命主体随之萎缩、麻木、被动,只会当圣言和官权的应声虫,昏昏噩噩而不自知,糊里糊涂地将自己的命运拱手交予地上的和天上的统治者。其最大的危害就是弱化了直面困难、解决问题的激情与能力,而将注意力引导到不务正事,推诿责任,热衷于虚功的歧路上,可怜复又可悲。后世的鲁迅曾用“不撻人心”来概括传统俗见对百姓生命主体的束缚,正与王充两千年前的认识相同。

所以,《论衡》还有另一种与世儒侧重不同的期待,即从世间普通民众所需的角度,发论立说。《论衡》也服务于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但与体制化儒学实际上落脚于治民驭民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生活中所说所传知识的准确与否,通过讥俗论实,“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掌握正确的知识,科学的道理,从而在掌握人生命运方面具有更大的主动权。他认为,《诗》之所以能在民间广为传播,影响深远,生命力正在于其需求发自民间,素材取自于民间,所传内容又有益于民间:“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没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至〕今。”(《论衡·对作》)《论衡》也应该是这样一部书。它关注民间百姓关心的问题,既努力汲取他们源自实践的良知和丰富生活的实例,也匡正他们受多方局限所形成的愚见和陋俗。“《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论衡·对作》)在实际中发挥开启民智的作用,所谓“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

正是缘于这样的抱负与追求,王充要求自己的文章明白易晓,能为大众所读。有人说,“讥俗”的篇章、内容过于浅白,不像正规学者的文章风范。王充说明,讥俗的文章之所以读起来浅白,主要是由阅读对象的定位及内容所要发挥的作用所决定。讥俗的目的在于剖析世俗中的种种“虚妄”,让众人“以觉失俗”,进而矫正自己错误的观念与行为,步入理性的正确轨道。欲实现此目标,须先让众人能够阅读,方谈得上“理解”。这就要求不光说理当通俗易懂,还需使用众人所熟悉的材料、说法加以剖析,“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他从另一方面反证说,如果不是这样,将给老百姓看的東西也写成经院式的宏篇高论,则无疑“对牛弹琴”,即便意愿良好,也发挥不了预期的作用:“以圣典而示

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论衡·自纪》)

《自纪》里的表白,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以自己认识到的科学真知,传达于民众之中,使他们意识到寰宇之内“凡事难知,是非难测”的事物实在太多,那些“众心俗论”“圣贤之说”,使“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必须拨乱反正,从“事实判断”的视角予以认识、清理,不受任何思想束缚地探索世界,追求真知,重建知识系统。敢于使用正确的方法怀疑成说,不去相信任何未经证实的主张,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从而激扬人的独立性、能动性。这个过程也就是确立人在自然天地中真实地位的过程,也即人本身觉醒的过程。

二、志所欲至,独已远矣

历史上重要思想家的传承与影响,会分为学术成果,思想方法和文化精神等几个层面,王充三者皆具,更以后两者显著于世。这是他的特别精彩之处。

《论衡》一书,以儒家学说为根基,以博通百家为情怀,以怀疑、批判精神为武器,以实证、科学方法为基石,成为当时理性精神的光辉代表,使之对后世的影响超出了儒家领域,而深化、拓展为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其不限于平面的、并列的几种思想观点,而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境界和不同侧面的内涵之间相辅相成,交叉互渗,立体化地对社会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官方统治者以及学者、文化人、大众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接触、感受这种思想文化精神的影响与冲击,地位不同,需求不同,受影响的程度和深度也各有千秋。后世学者在继承王充的学术精神治学求道,传播自己思想成果的过程中,也就用这种文化精神影响着民众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

王充所构筑的思想文化精神可以从下述几个层面来认知。

最高层面者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种精神本为孔子所倡导、履行。先秦百家争鸣,儒学为其中之一,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家“和而不同”,平流竞进,乃人尽其才,学术繁荣之大道,搞思想专制,无论推崇哪一家,只能束缚人的创造力。王充深谙此思想精髓,论曰:人同万物一样,“禀气而生,含气而长”(《论衡·命义》),但人同时具有与它“物”的不同禀赋——精神和智慧:“夫昆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论衡·辨崇》)所以,人理当珍惜这种禀赋,此乃关系到作为独立的主体,能不能用自己的眼光和头脑认识世界的问题,激发内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儒者所怀,……力独多矣。”(《论衡·效力》)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受各方条件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欲进入主体高扬、自由创造的状态,是件难之又难的事情,受碍于头脑中的重重禁锢。汉代官方的意识与民间的俗论,扭曲了人们的思想认知能力,构成一种惰性的文化导向,讖纬风行于上下便是力证。尤其是实行“抑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非议“五经”,提出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还构成为大逆不道,受到舆论的指责。王充思想文化精神最具光辉之处,便在于提出了一个比圣言、鬼神更神圣、更伟大的“天道自然”观念,它将人们不受约束地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视为“天道自然”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种“天赋人权”,为超越种种人为的精神樊篱,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论衡》中对怀疑、批判精神、独立思考权力的天然合理,作了有力论证。“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论衡·自纪》)若一代代人都讲究“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这便是王充所认定的治学时必先要树立的怀疑精神,不能认为圣贤穷尽了所有事理,后学只有接受、理解的份儿。王充更可贵者还在于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成果向世人证明,“实事疾妄”学说的问世,完全得益于自由思想的抚育。而王充思想也正是在这种争议中,一次次地充当了历史上重大思潮转折中的启动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乃其思想文化精神中的灵魂,属于对全社会一束普照的光,影响是全面性的,既引领学者学风、文化人性格,也熏陶民众观念。

第二层内涵为“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树立一种以圣言成说为准则的“价值判断”认识论。凡事皆有先验之说,盖棺之论,陷于神学加经学的思维定势中,以《白虎通义》的问世为标志,认识水平距真实的客观世界越来越远。王充构架了一个感性知识与理性思维交叉互动,书本记录与观察经验相互映证,最终将一切真知考之于“效验”的治学思路,为“事实判断”思维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居统治地位的价值判断思维之外,另立了一种事实判断思维。这种理论思维,构成了“南方思想”以及后来浙学的源头。蔡元培曾论:“儒之普通思想,为学理进步之障者二:曰迷信,曰尊古。”王充敢于冲破这种官方思想的禁锢,大胆批判,创建己说。“王充对于迷信,有《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等篇。于一切阴阳灾异及神仙之说,掊击不遗余力,一以其所经验者为断,粹然经验派之哲学也。”蔡元培以自己的深刻眼光,在学术界第一次点出,王充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一以其所经验者为断”^{[2]63},可以说是找到了经验派学术方法在中国本土的先驱者。对于老一辈学者所致力于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工作,诚为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判断”思维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稀有资源,反映着认识世界的科学眼光,尤其是认识上的经验实证方法,胡适先生称之为现代经验、实证法的古代版。“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3]这不仅对学者治学至关重要,于普通民众亦是认知方式的另一种引导和启迪。吕振羽指出,王充的思想基础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即从根本上认为宇宙天地,自然万物,皆属客观存在,自然运行,自生自灭,不受神或人的意志所左右^[4]。

第三层内涵体现为求索创新的治学风格。这关系到认识世界的境界问题。王充的精神世界博大恢宏,凡“俗间凡人所能见”者无不关注,以客观世界的“天下之事,世间万物”为认识对象,以“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为己任。在治学中充分展示了“怀百家之言”“博通众流百家”的气度和胸怀。又关注、汲取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以探求尚未认知的世界为终生热爱。王充正是在此广博、繁杂的基础上,借鉴、运用自然科学经验、实证的思维方法,对“世间万物”考论虚实,融会贯通,焕发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推出了在中国思想史中独树一帜,有着原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在蔡元培眼中,《论衡》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非同一般:“充实为代表当时思想之一人,盖其时人心已厌倦于经学家,天人感应五行灾异之说,又将由北方思潮而嬗于南方思想。故其时桓谭、冯衍皆不言讖,而王充有《变虚》、《异虚》诸篇,且以老子为上德。由是而进,则南方思想愈炽,而魏晋清谈家兴焉。”^{[2]64-65}侯外庐、赵纪彬等当代学者认为,王充的思想体系,乃“是汉代正宗哲学的反对命题”,在“正宗”思想由神学堕落为谶纬迷信的黑暗期,其基本立场是用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无神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说和鬼神迷信,“从而导出了他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5]对于这种创新精神,有学者用“唯实论”概括之,论其开辟了“实学”学派的先河^[6],求索创新精神的继承者和受益者主要为后世学人。

第四层内涵乃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成果。这关系到认识了什么的问题。王充用“疾虚妄”“求实诚”的指导思想,邃密群科,分门别类地创立了自己的气论、天论、形神论、命定论、政治论、历史论、文学论等等。这些学术观点以相对科学的见解和知识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尤其是针对历史上天命论、鬼神论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论衡》中关于无神论的雄辩论述,“天道自然”的多方说明,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就流行的“谬见”作了廓清,不仅称得上中国思想史上这方面的经典成果,更对沉浸于天命鬼神中的大众有深远的启蒙意义。据陈桥驿先生考证,《论衡》一书涉及吴越史地的资料丰富多样而弥足珍贵,不独包括山川形势,国界地域,更有虫鱼鸟兽等各种信息,“所有这些资料,都是他在自己的故乡所耳闻目睹的,加上他自己的敏锐思考和精密的分析能力。因此,较之中原学者道听途说的记载无疑要丰富和翔实得多。”^[7]王充在各个领域中的见解,可以说代表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某些地方还很有些超前性,在它问世的近两千年中,一直发挥着科学启蒙作用,每临社会上迷信泛滥、虚妄横行之际,便会有人拿起王充“实事求是”的思想遗产予以反击,进而宣扬“实学”,普及真知,成为社会进步中理性高扬的重要资源。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学人,仍在从《论衡》中汲取“顺应自然”,实现万物和谐的精神养分。科技史研究者关增建,从物理学“量的概念”的视角,考

察了其与“无神论”的关系,指出王充认为天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但人的行为却不能感动天”(“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的论断,是认识到“二者在量的大小上差别太大”。无愧于古代发现“量”概念的先驱,“他特别注意考查不同物体同一属性在大小、多少等方面的差异,注意物体的尺度、重量等属性以及物体间相互作用范围、远近距离变化等因素,以此来揭露批判对象的荒谬,这使他形成了注重量的概念的独特思想方法,使得量的概念成了他建立自己的无神论学说的一个重要出发点。”^[8]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王充凭着细致观察、直觉把握、深入思考所得出的许多自然科学见解,成为古代科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尤其是他擅长哲学抽象与思辨的能力,往往能见微知著,超前提出了今天用科学实验手段才得以验证的某些原理。这层文化精神的覆盖面相当大,学人与大众均受其惠。

上述多重的思想文化精神导向与影响,其最终落脚点皆在于:冲破“不撻人心”的思想网罗,塑造具有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生命主体。“他的文学思想和他的天人观相结合……使文学从神和皇帝的权威、礼乐教化思想的束缚中独立了出来,使得汉末、魏晋具有多样性和个性的文学创作有了可能性。具体地表现是,他使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瓦解,同时使以人为主体的文学时代到来了。追求‘真美’同对社会美和自然美的认识相联系,清除了复古模仿文学,对文学的价值开始有了认识。同时,他有关气和文学的论述,形成了王充—《太平经》—曹丕—葛洪—刘勰的文气论体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经历了以汉代儒学为中心的政教中心论到魏晋的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审美中心论的演变过程。在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转折时期,有小赋、‘古诗十九首’等抒情文学和建安文学等文学现象存在。而王充早在这之前的东汉时期就为这种变化打下了基础。”^[9]无论对学者还是大众,《论衡》都有一个根本的愿望:“观书而自觉”,从而激扬主体,做个具有理性头脑,能够超越世俗文化桎梏而表现出“力独多矣”的创造者。在这一点上,王充本人就是一个示范,一个参照。力排众议,独扛俗论,问难圣贤,自成一说。虽然,在世间俗论眼中,这是一个另类,但这个另类不仅坦坦荡荡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走的精神飞扬,掷地有声。对此,《自纪》的字里行间布满了坦然与自信。

与历史上的大多数学问家不同,王充的学说当之无愧地成就为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并且这种精神的影响与传承,不单局限于学术学人领域,还直接或间接地播扬于民间的思想文化之中。文化精神与学术精神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相异之点。文化精神涵盖了学术精神,又以学术精神为内核外延至百姓生活中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对塑造大众主体意识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形成持久的影响与引导。这种超出学术领域的文化影响,既是王充有意识的追求,也是后世的客观存在,不失为王充有别于许多主流学术思想家的一个特征。归根到底,王充的思想文化精神就是“三真”:求真知、探真相、说真话。看似简单,从古至今能具备如此智识和勇气的担当者廖若星辰。

参考文献:

- [1] 吴光. 王充学说的根本特点——“实事求是”[J]. 学术月刊, 1983(6): 16-20.
- [2] 蔡元培. 中国伦理学史[M]. 河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 [3] 胡适. 王充的哲学[M]. 上海: 大东书局, 1931: 15-16.
- [4] 吕振羽. 中国政治思想史[M]. 上海: 三联书店, 1955: 333.
- [5] 侯外庐, 赵纪彬. 中国思想通史: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261.
- [6] 周桂钿. 王充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369.
- [7] 陈桥驿. 《论衡》与吴越史地[J]. 浙江学刊, 1986(1): 221-225 + 229.
- [8] 关增建. 量的概念与王充的无神论学说[J]. 郑州大学学报, 2001(4): 112-116.
- [9] 金钟美. 天、人和王充文学思想——以王充文学思想同天人关系思想的联系为中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213-214.



(责任编辑 陶舒亚)